



助力决战脱贫攻坚 扛起央企使命担当

□ 雷鸣山 王 琳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发出脱贫攻坚总攻动员令，全面吹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冲锋号。当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近在咫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得到历史性解决。作为生来具有红色基因和责任基因的中央企业，三峡集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意义和自身肩负的责任使命，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扛起央企使命担当、贡献三峡力量。

听党指挥，坚决当好助力脱贫攻坚主力军。三峡集团党组深刻认识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最为牵挂、投入精力最多的民生大事，是直接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作为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发展壮大的中央企业，三峡集团始终牢记“为国担当、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始终把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来定位，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报国家和社会的实际行动来落实，投入真金白银、倾注真情实意、做到真抓实干，当仁不让当好助力脱贫攻坚的国家队和主力军。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集团主要领导亲自指挥，坚持一季一调度、一月一督办，并定期赴扶贫一线现场办公、调研指导；坚持全集团“一盘棋”，建立全员参与、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帮扶组织体系，凝聚全员攻坚合力。二是加大投入力度，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过85亿元，2016年以来年均投入超过14亿元。三是选优配强扶贫干部，累计选派扶贫挂职干部近百名，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面对面对接帮扶需求，手把手落实帮扶项目，肩并肩寻找致富之路。

集中力量，精准聚焦下足绣花功夫。多年来，三峡集团紧紧围绕国家定点扶贫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累计投入资金86亿元、实施帮扶项目298个、委派挂职干部38名，成功助力重庆巫山县、奉节县、江西万安县、内蒙古巴林左旗

实现脱贫摘帽。在定点扶贫过程中，坚持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想办法、出实招，努力将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一是始终把教育扶贫摆在突出位置，累计投入资金超过2.6亿元，新建扩建幼儿园8所、小学22所、中学8所、职教学校3所，并探索实施了以“走进大国重器、激发心中梦想”为主题的“三峡娃娃行”系列教育帮扶行动，“智”“志”双扶助助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二是始终把健康扶贫作为重要环节，累计投入资金超过2.2亿元，援建县级医院3所、乡镇卫生院7所，新建扩建村卫生室49所，并在奉节和巫山投入1.26亿元设立“医疗救助基金”，对贫困患者自付比例超过10%的部分给予兜底救助，多措并举助力贫困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三是始终高度重视贫困群众的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累计投入资金近1亿元，实施安居项目30个、饮水安全项目22个，极大改善当地群众人居环境，惠及人口超过20万人。2018年和2019年，三峡集团连续两年在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考核中获得“好”的评价，位居中央企业前列。

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培育内生动力。在定点扶贫过程中，三峡集团始终高度重视产业扶贫，千方百计助力贫困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脱贫和发展优势。一是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模式。结合巫山当地资源禀赋，通过为其量身定制特色旅游线路、打造特色旅游产品、赠送旅游大巴车、加大市场营销宣传等措施，2019年帮助巫山新增引入客流超过20万人次，新增就业岗位超过2000余个，增加旅游收入1.3亿元。二是复制推广“新能源+扶贫”模式。总投资约10亿元的巫山三溪乡、两坪乡195兆瓦光伏产业扶贫项目，建设期已为当地提供20万个工日的劳务岗位、为当地群众增收约3000万元，建成后每年可新增税收1400多万元。三是积极培育“生态+扶贫”模式。结合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主动将定点扶贫县纳入长江大保护合作区域，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县域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其中，首期投资约5亿元的万安县城城乡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将极大改善当地生态涵养水平，优化县域生态和产业发展环境，助力当地绿色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三峡集团还积极参与出资设立央企产

业扶贫基金，累计出资10.64亿元，与兄弟央企一道助力贫困地区培育特色产业、增强造血功能。

主动请战，助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在扎实做好国家定点扶贫的同时，三峡集团主动将帮扶资金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2016年至2019年主动请战捐资36亿元，助力云南怒族、普米族、景颇族3个人口较少民族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在两地地方党委政府及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努力下，累计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建成三峡新村80个，新建、升级改造住房2.26万户，完成各类基础设施项目634项，新建、修缮村组道路1265公里；在云南3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建、升级改造住房1.72万户，新建、修缮乡村道路1233公里；成功助力普米族、景颇族实现整族脱贫，云南怒族和四川凉山彝族已经具备整族脱贫条件，直接和间接惠及人口超过27万人。2019年至2020年，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关键时期，三峡集团又向云南昭通市和四川凉山州、宜宾市、攀枝花市累计捐资10亿元，助力啃下深度贫困“硬骨头”。此外，三峡集团还积极参与援疆援藏援青，累计投入6亿多元助力民族融合和边疆繁荣稳定；全力做好库区移民帮扶，在移民工程投资和三峡后续规划之外累计投入10亿多元帮助三峡库区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主动从金沙江已投产电站发电收益中计提基金支持金沙江库区后续帮扶，确保库区移民在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战疫战贫，关键时刻体现责任担当。在大战大考面前，三峡集团第一时间开展捐资抗疫活动，累计向国内抗疫一线捐款1.7亿元、捐赠医用防护物资235万件；累计向长江沿线53个市（区、县）捐款近1亿元，助力长江大保护项目加快复工复产。第一时间启动“抗疫稳岗扩就业”专项行动，率先提出校园招聘优先录用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并拿出200个指标专门招聘湖北生源；首次开展“贫困生”招聘，拿出100个指标专门招聘帮扶地区贫困家庭生源，助力“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积极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上半年境内农民工高峰时段的用工量大大超过去年全年的最高值。第一时间启动消费扶贫行动，针对帮扶地区和湖北疫区农副产品销售难题，三峡集团先后4次印发消费扶贫通知，明确消

费扶贫任务，通过任务层层分解、全员动员、每月督办、线上线下和内外结合等方式，千方百计拓宽积压农副产品购销渠道，今年1—9月份全集团直接购买帮扶地区和湖北疫区农副产品近2000万元，帮助销售农副产品超过2300万元，有效遏制贫困农户因疫致贫返贫风险。

从严从实，弘扬真抓实干过硬作风。三峡集团党组深刻认识到，脱贫攻坚，最讨人嫌的是形式主义、花架子，最让人厌的是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最让人恨的是弄虚作假和贪污腐败，必须带着感情做、真心实意抓、实实在在帮、干干净净扶，确保贫困群众真受益、得实惠。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三峡集团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消极腐败等现象。一是以实的作风摸底数、想办法、解难题，坚持把贫困群众的需求作为帮扶的第一选择，真心实意帮助贫困群众排忧解难。二是以严的要求加强项目管理，坚持实施从申报立项、实施审批、过程监管、竣工验收到后评估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严格落实项目责任单位和监管人责任，确保每一个项目都是群众需要的项目、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三是以铁的纪律加强扶贫监督，坚持扶贫协议和廉洁协议一同签署、一同落实，坚持每年开展扶贫项目实施情况“回头看”，坚持将扶贫工作纳入内部审计、纪检监察和巡视监督，坚持严肃执纪问责，确保脱贫工作过程扎实、结果真实，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旌旗猎猎，击鼓催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倒计时之际，三峡集团将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劲头不松，全力以赴完成年度各项帮扶目标任务，积极谋划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坚决为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贡献应有力量。

（作者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人之立身 唯在诚信

□ 王 杰

我们都知道，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一个有品行的人必备的品质。我们总说“一诺千金”，即答应承诺别人的事，就如千金般贵重，一定要兑现。从这个流传千年的成语里，就能看到“诚信”在我们的传统美德里占据的重要地位了。

《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里的“诚”，指的是自然界一切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虚假。我们人作为天地万物之灵秀，应该把追求真诚作为立身处世之本。《论语》也讲：“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谨而信，泛爱众”；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说：“朋友有信”，都是在强调诚实守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只有彼此真诚，才能成为朋友。

所以，“诚信”二字需要拆开来看。诚，是内在的品质；信，则是外在的表现。怀着诚实不欺的心，并付诸实际行动，这就是“诚信”。

在古人看来，诚信就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輹，其何以行之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如果没有信

用，那真不知道怎么能行于世、立足于社会，没有了诚信就像是车没有了马和车身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杠与横木相接的销钉，还能靠什么行走呢？

所谓“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外无物”“宁失千金，不失诚信”，历史上关于诚信的故事更是比比皆是。

《史记》中有一则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说的就是取信于民的事。秦孝公时期，商鞅任丞相，为了推行新的法令，让老百姓遵循，就必须取信于民，得到百姓的支持。于是，商鞅想出一个方法，他命人把三丈高的木头立在国都的南门，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给予谁十金的赏赐。百姓感到非常奇怪，谁能这么容易就得到十金，所以就沒有人去搬这根木头。随后，商鞅又发布命令，能搬者给予五十金的赏赐。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把这根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政府诚信不欺。这一立木取信的做法，让秦国的老百姓相信了商鞅的言而有信，从而使新法得以顺利地推行实施。后来，同样立志推行改革的宋代大臣王寅书写了一首诗来赞扬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诚信不仅是处世之本，也是立业之基。因为诚信不仅仅是个人品行的重要特质，而且在成就事业方面，也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大家看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依靠诚实守信而取得巨大成就的著名人物。比如说，春秋战国之交的“陶朱公”范蠡，他经商有道，重视诚信，后世的生意人，都供奉他的塑像，尊称他为“中华商祖”。

对于个人来说，要想培养高尚的品行，最基本的就是要讲诚信；对于现在的企业来说，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而诚信，就是企业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对于政府来说，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取信于民。

现在我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更应该强化诚信意识、加强诚信建设、打造诚信中国，这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实现社会稳定、提升国际影响力，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党史上的为什么（6）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内纪律与规矩建设，而在党内纪律与规矩中最根本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四个服从”。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强调：“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在这里，已经提出了“三个服从”。至于“四个服从”的完整提出，则是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

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四个服从”，除了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外，与王明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不尊重党中央，与党中央闹独立性有很大的关系。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随后出席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在报告中一方面强调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之后在统一战线上本来正确的主张加以批评与指责。12月会议后，王明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统一战线中出现迁就国民党、轻视敌后游击战等问题，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193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央第66次常委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制定国民党领导抗日的路线、方针及政策。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对这次大会都很重视。3月21日，王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报送中共中央一份，但未等中共中央答复，就于24日将这个建议书交给国民党。3月25日，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建议书后，认为这个建议书“有严重缺点”，于是另行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长江局收到中共中央这个电文的时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本来有时间将这个建议书送给国民党，同时将与长江局起草的建议书收回。但是，王明既不将中共中央的建议书送交给国民党，也不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共中央，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将结束，长江局才于4月1日电告中共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产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且不论这两个建议书的内容如何，王明此举确有不尊重党中央，与党中央闹独立性之嫌。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演讲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以后只是在《新群丛书》中作为第15种出了个单行本。

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闹独立性，还表现为到达武汉不久，便未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审阅同意，在《新华日报》发表由他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华社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既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也未同任何人打招呼，公开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王明甚至以长江局成员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由于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而朱德、彭德怀及项英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去武汉，于是有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比在延安的多，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竟然提出中央政治局会议应在武汉开。对于这些问题，后来王明辩解称，是自己“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分析了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战略相持这个新阶段后的形势与任务，明确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

为什么要提出『四个服从』？

□ 罗平汉

六届六中全会

题”。要求共产党员应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地讲到了强化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亦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最高的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

六届六中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其中《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很大程度是针对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的所作所为的。文件决定：“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国内外发表言论与文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须完全执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与行动。”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亦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从此，这“四个服从”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由此可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不但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且立下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纪律，这对于确保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争取抗战胜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